



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丛书

素质教育
的伟大工程

郭一平 主编

目 录

上编 新中国的中国中小学教育.....	1
一、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回顾	1
二、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就与影响	31
三、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历史启示	47
四、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展望	57
下编 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	62
一、实施“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的背景	62
二、实施“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的主要措施	72
三、全国实施素质教育开端良好，进展较快.....	79
四、实施素质教育典型经验	90

上编 新中国的中国中小学教育

一、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回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任何社会性质根本不同的新时代。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不断的改革，不懈的探索。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新中国的教育也经历了在曲折中发展，在迂回中前进的过程。它一方面在群众性教育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变更与突破；另一方面，又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以及各种教育思潮、教育观念的影响下，不断革新自身，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也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令人欣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饱尝了沉痛的失败与教训，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从中我们获得了今后教育改革的明确方向，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内在动力。认真总结这段历史，无疑对于我们今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国近50年来，我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进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一）1949～1957年初创时期的教育改革；（二）1957～1966年探索时期的教育改革；（三）1966～1976年动乱时期的教育改革；（四）1976～1997年重建与

发展时期的教育改革；(五)1997——至今新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现将这5个阶段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一)初创时期的教育教学改革(1949~1957年)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旧中国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议题是对旧教育的改革和全面学习原苏联的经验。

对旧教育的改革，主要是在1949年至1952年间进行的，这三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指明了我国前进的道路，也规定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根据这一总路线的精神，我党制定了这一历史阶段发展教育的总目标是：把“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深受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毒害的教育”，彻底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完全适合正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建设需要的新型的教育”。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同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着重讨论了如何对旧教育进行有步骤的改革问题，确定了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在会上指出：“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现在，随着

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统治在中国宣告终结，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而这种改革正如我们的共同纲领所规定，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这就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

1953年起，我国陆续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开始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面临着如何在改造旧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问题。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育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样本。当时，我们认为，苏联的教育经验“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及高度工业化的反映，是苏联经过36年努力的成果，应该是我们长期学习和不断努力奋斗的目标。苏联教育的先进性表现在思想体系、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等方面的有机联系，我们应该运用苏联先进经验进行一系列全面改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1957年。由此可见，1949~1957年这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的教育改革集中体现在改革旧的教育、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两个方面，其具体措施主要有：

1. 接管和改造旧学校，掌握教育的领导权

全国解放后，各地区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学校实行了接管和改造，如：“1949年2~5月，北平市军管会接管了市立中学和中心小学，6月颁布了《私立学校临时管理办法》和《私立中小学董事会暂行组织纲要》。此后，转入对私立中小学的整顿工作。……1951年，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接管了27所接受外国津贴的中小学。”与此同时，对旧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反动的党义、公民课及童子军训练。取消了反动的训育制，实行教导合一制度，对学生实行民主管理。”如此改革，使学校教育从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变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学校教育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真正体现了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大政方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2· 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学制实际上存在两个系统：一是老解放区的学校系统；一是初步改造了的旧的学校系统。1951年8月10日第97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0月1日起执行。《决定》指出：“我国原有的学制（即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有许多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补习学校及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初等学校修业六年并分为初高两级的办法，使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女难于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适应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这些缺点亟需改正。”改

革学制，就是为了克服旧学制的弊端，建立与新中国国家性质相一致、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学校教育制度。针对旧学制的弊端，改革后的新学制体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突出了工农干部学校、各类实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应有的地位；小学修业年限改为五年一贯制，有利于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充分体现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各级各类技术学校在学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以解决国家建设急需人才的要求；各级各类成人学校入学年龄不求一律，保证劳动人民及革命干部受教育的机会；设立各级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以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的革命政治教育。

新学制基本上符合当时国家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在执行过程中有两处重要修改：一是原定从 1952 年起 5 年内将全日制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但因师资、教材等准备不足，五年一贯制在绝大部分地区难以实行。因此，教育部又决定从 1953 年秋季起一律暂缓推行。另一处修改是在学制中有关工农速成中学的规定，经过几年实践证明效果欠佳。1955 年 7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这类学校相继结束。

3· 改革教育体制，实行统一管理

1949 年至 1952 年，新中国在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同时，对全国的教育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举凡制定教育的方针政策、教育规划、教育规章制度等，权力集中在中央；办学体制，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办学为主；招生和毕业生分配体制，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培养、统一分配。

人事劳动体制，实行统一调配、统一工资标准；经费和物资管理体制，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划拨，等等。

4· 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建国初期，全国兴起的学苏热潮，最集中、最典型的还是反映在学校教育的教学改革中。由于缺乏办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经验，因此，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把苏联的教育、教学模式搬到了中国来。小学和中学，由于学习年限和阶段划分与苏联不同，因而没有全部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材，但是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受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较大，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多是因袭或采用苏联经验。这一时期的教育、教学改革深深地打上了“苏化”的烙印，甚至可以说，改革就是学苏。

(二)探索时期的教育教学改革(1957~1966年)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前一阶段学苏出现的偏差，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教育体系和模式，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的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次改革是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为主要特征，以毛泽东有关教育论述为出发点，伴随着对苏联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全盘否定进行的。

在苏联传统教育模式的全面影响下，1956年以后，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二是学生中普遍存在忽视政治的倾向，学校教育只抓智育。针对这些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全面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对青年一代的要求，突出了德育的重要

位置，反映了培养劳动者的时代要求。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必须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进一步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突出了政治对教育的影响作用。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指示》还确定了教育改革的总目标：“坚持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反对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一方针与目标，与当时“大跃进”的形势相配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浪潮，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开展勤工俭学，促使教劳结合

勤工俭学始于1957年，它不仅有着直接的经济意义，即在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通过这种形式解决一部分教育经费，以保证青年学生的受教育机会。

“勤工俭学，就是说要求学生和青年不依靠国家和家庭，而依靠自己，设法读书和升学。”而且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即能够克服青年学生中存在的轻视劳动的思想，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后来，这项教育改革被提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举措来认识。

1958年1月2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指出：

“这种一面劳动、一面读书，勤工俭学的活动，对于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在这一《决定》的号召下，全国上上下下各级各类学校都加强了劳动教育，实行勤工俭学。很多民办学校都是实行半耕半读，依靠学生的劳动收入来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事实证明，实行勤工俭学，不仅能加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培养劳动观念和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精神，使学生获得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增强学生体质；而且也有助于巩固、扩大和加深课堂上所学得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效果。这在当时被誉为一项重大的教育革新。

令人遗憾的是，这项革新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逐渐误入了歧途：勤工俭学，没有了学；一面劳动，一面学习，变成了单纯的劳动。尤其是在“大跃进”的社会形势推动下，对学生劳动时间的限制被冲破。到1958年9月，中等以上各级各类学校及小学高年级师生开始普遍停课，投入到大炼钢铁的三秋劳动中。这年9月底，据20个省市的统计，有22100所各级各类学校建起了小炼铁炉、炼钢炉86000多座。另外，在这股热潮中，还兴起了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之风，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创举。往往在几昼夜之间，一个学校内就办起几个、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工厂、车间和作坊。10月中旬，20个省市的统计，有397所高校共办工厂7240座；13000多所中学办工厂144000座。同时，许多学校办到工厂里，由工厂统一管理。

2·改革教育制度，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

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即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劳动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劳动制度。并指出：“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根据这一精神，1958年9月，中央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了学制改革的3项原则、6个并举，即“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结合；在办学的形式上应该是多样化，即实行“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这3项原则和6个并举，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地方和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它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学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58年以后，许多地方开展了学制改革的试验，如提早入学年龄，进行了6岁儿童入学的试验；为了缩短年限，进行中小学十年一贯制的试验；创办了农业中学、半工农半读学校，进一步发展了业余学校。全国出现了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三类主要学校，从而构成了我国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三类学校并存的学制体系，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学习要求，以及实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盲目发展、急功近利，以及凭主观愿望，而不是遵循教育规律发展教育的偏颇。据《光明日报》

1958年10月1日报道：本年新建中学26000所，新办高校860所。河南省鄆师县白坡乡，由1957年的4所小学（1所完小）一下子发展到29所小学、4所中学；南京市7天办了263所职业中学。

3· 改革教学制度，确保教育目的的实现

在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的同时，对学校的课程安排、教材设置、教学方法等也进行了大改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应当成为一切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提高师生政治觉悟、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生团结的普遍和经常采用的方法。”制定学校教学计划，制定教学大纲的时候，应当采取党委领导之下教师与学生结合的方法。”“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劳动，等等。因此，“三结合”编写教材，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教学方法，“现场教学”的教学形式，以政治标准衡量教学质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便构成了这一时期学校教学改革的主色调。

4· 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步伐

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同时，下放教育管理权，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改变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强地方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小学、普通中学、职业中学、一般的中等专业学校和各级业余学校的设置与发展，由地方行政自行决定。所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种社会活动、勤工俭学计划、地方干部和教师，都由地方管理。教育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职

责是：集中精力研究和贯彻执行中央的教育方针政策；综合平衡全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指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组织编写通用教材；拟定必要的全国通用的规章制度；及时总结交流经验，等等。确立如此教育管理体制，以促使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50年代末的这场“教育大革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与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也造成了教育事业的畸形发展。1961年1月14~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教育事业上也相应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学校和专业的调整、整顿，并放慢速度，压缩发展规模，精简教职工，以改变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状况。1963年初又分别颁布了《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草案)》(中学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小学四十条)，使学校各项教育工作基本上得到了恢复，教育质量也逐步得到了提高，教育事业得以稳步发展。

(三)动乱时期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1966~1976年)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建国以来最大的政治动乱和社会混乱，也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的一场浩劫。这灾难深重的10年，给作为重灾区的文化教育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因此，这一时期进步与倒退、正确与错误的斗争首先突出地反映在教育领域。教育革命的发动者不仅要“砸烂一个世界”——批判旧的教育路线和教育思想，而且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推出新的教育路线和教育思想。

1·破“旧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大中小学学校先是停课闹革命，继而是工宣队进驻学校并展开了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批判。大批判几乎是千篇一律地把“文革”前的教育斥为“封、资、修的大杂烩”；把抓教育质量视为“智育第一”；把学生认真读书说成是“走白专道路”；把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当成培养“精神贵族”和“资产阶级接班人”；把实行校长负责制和发挥专家作用说成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大批判”的主要内容有：

(1)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

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是当时“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政治运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与其说是教育思想批判，倒不如说是政治思想批判。从教育观点看，当时批孔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点：

其一，孔子教育是以“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目标的，培养维护奴隶社会统治的“保守派”，不是革新派。

其二，孔子教育不向学生传授生产劳动知识。

其三，学生不会种地种菜，四体不勤，鄙视劳动人民。

其四，鼓吹超阶级的人性论(仁爱、中庸等)，反动的伦理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

由于当时全国性的批孔运动与批判林彪集团直接挂钩，没有贯彻毛泽东主张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加之“四人帮”为达到篡党夺权之目的，故意抛弃党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采取了篡改历史、实用主义的批判作风。所以，我们说，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更新教育

观念，斧正教育思想，而是要维护“教育革命”，否定17年教育。

(2)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

1969年9月,《辽宁日报》发表社论,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是搞所谓“全民教育”、“专家治校”和“智育第一”。1970年1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一文,文章从三个方面批判了凯洛夫《教育学》。这一时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主要批判的是其超阶级的“全民教育”观点,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背道而驰的“专家治校”观点,忽视无产阶级政治的“智育第一”观点,脱离工农兵和劳动生产的“三中心”(教材、教师、课堂),以及化公为私的“知识私有”观点。

现在看来,当时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首先是非科学的,其次是非历史的。这种批判不过是把中国当时的政治概念和命题生搬硬套在凯洛夫的《教育学》上而已,其做法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东拼西凑,移花接木,随心所欲地妄加解释。批判的实质同样是要维护“教育革命”的成果,扫除“教育革命”中的障碍,进而为全盘否定17年的教育路线,彻底推翻无产阶级教育理论体系制造反动舆论和理论根据。

(3)对17年教育的批判

如前所述,对孔子教育思想批判和凯洛夫《教育学》批判的真正目的都是对17年教育的批判,即对1949年建国以来到1966年这段时期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思想及整个教育事业的全盘否定。“文革”开始以后,尤其是工、贫宣传队进驻学校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17年教育的批判。批判是从1966年对高校招生、分配制度

的批判开始的。那时认为现行招生分配制度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不利于更多的工农兵青年进入高校。进而对17年所实行的抓教育质量、校长负责制、发挥专家作用、“两种教育制度”、办重点学校、大中小学工作条例、直至教育的方针和政策等，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历史证明，17年教育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更不是修正主义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在曲折与艰难中探索和创建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其间，我们虽然有过许多失误或失败，但是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其运行的轨迹始终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四人帮”等兴起的对17年教育的批判，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乎逻辑，纯属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决非什么学术批判。

2·立“新教育”

“破”和“立”是“文化大革命”中讲得最多的辩证法。“教育革命”只是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的批判自然是很不够的，还必须通过介绍教育经验，树立教育典型，建立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教育体系或模式。这一时期的教育经验总结与典型宣传，基本上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现和塑造典型，或根据毛泽东在某一调查经验总结上的批示，加以推广。

(1)《五·七指示》与走“五·七道路”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军委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政治、军事、文化，从事生产，批判资产阶级，进而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

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五·七指示》，它对当时的“教育革命”起着纲领性的指导作用。为了全面贯彻《五·七指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掀起了走“五·七道路”，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热潮，并涌现了各种各样走“五·七道路”的教育模式，如甘肃兰州第五中学的“厂办校、两挂钩”的模式。

《五·七指示》可以说是毛泽东试图建设一个新世界，包括新的教育世界的总纲。它实际上是将1958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思想加以具体化。希望通过学工、学农、学军与教学并存，通过批判资产阶级，达到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人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教育状况的错误估计，加之“四人帮”利用《五·七指示》大作文章，使中国教育因此而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劫难。

(2)“教育革命”的集大成——“朝农”教育新模式

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七·三指示》等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下，加上“四人帮”的肆意歪曲和胡作非为，全国四面八方，遥相呼应，涌现了无数的教育革命经验和教育革命典型。如：交白卷英雄张铁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反师道尊严小将黄帅《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分数挂帅”的典型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对“智育第一”、“文化至上”的典型《园丁之歌》的批判，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所有这些最后归结为朝阳农学院的教育新模式中。这是一个“教育革命”的推进者们自以为可以向世界宣布的独一无二的世界新模式：工人阶级的